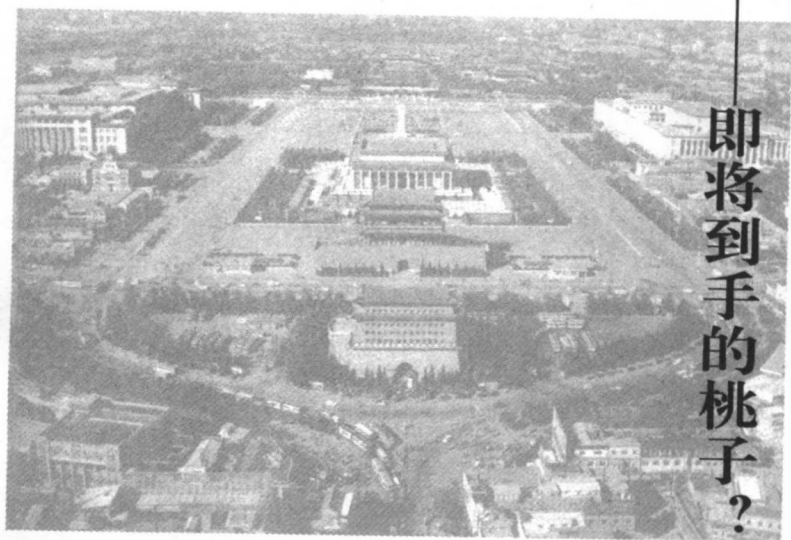


引言

现代化

——即将到手的桃子？



1 若干年以后，子孙们在写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惊讶于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和执着。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上上下下的政府红头文件，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网络，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在所有一切能承载时代的历史材料中，出现频率最高、最中心、最执着、最为人们所关注和神往的话题就是“经济增长”。

正如“革命”是 20 世纪初迄至 70 年代末的“图腾”一样，“经济增长”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腾”。而促使从“革命图腾”到“经济增长图腾”的转变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将中国人从“革命”的思维惯性（意识形态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是“革命”的产物）束缚中拉回到“经济增长”思维的轨道上来，终于形成万流汇聚不可逆转之势。

历史犹如“跷跷板”。40 岁左右的人（如笔者）有幸跨越了这两个时代，如今回味起来，这随历史起落的滋味还真有点像坐“过山车”，急剧的转折让人觉得头晕，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2、一切恍如梦境：1958 年“大炼钢铁”中提出的被后人视为不切实际、“放卫星”的“钢产量”“赶英超美”的目标，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中国钢产量已连续 6 年居世界首位，2002 年达到 1.8 亿吨，相当于居第二名的日本钢产量的两倍；20 世纪 60

年代同样被后人视为“放卫星”的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神话，现在已经是稀松平常事，农民在为粮食多了卖不出去、政府在为谷贱伤农而一筹莫展；旧中国什么都是外国制造的，“洋货”满天飞，如今，“中国制造”摆满欧、美、日、亚、非、拉各国超市的货架，中国几乎各类制造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都在不断地快速攀升，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已有 100 多种商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行业遍布纺织、家电制造、通讯设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 10 个行业，以 2001 年为例，彩电的产量为 3936 万台，占世界总产量的 29%，洗衣机 1443 万台，占世界的 24%，冰箱 1279 万台，占世界的 16%，空调 1827 万台，占世界 30%，电风扇和照相机分别为 7661 万台和 5514 万个，世界份额均超过 50%，电话机产量为 9598 万台，占世界的 50%，显示器年产 4590 万台，占世界 42%，钟表 15 万只，占世界 75%，青霉素和土霉素的世界份额分别为 60% 和 65%，维生素为 50%，拖拉机和集装箱占世界份额的 83%；仅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美、日的众多商家仍将中国市场列为“边缘市场”，只将在欧、美、日主流市场上淘汰的性能款式均“过气”的产品投放中国市场，如今，同样的商家已经是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市场推出最新款式最佳性能的产品了，为了更贴近中国市场，它们还纷纷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2002 年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二，中国电话装机量、手机拥有量均居世界第一……“革命时代”的人们做梦都想做到而怎么也做不到的，现在做到了，那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也做到了。

3、于是，“中国的崛起”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的话题。“谁来养活中国人”，说的是当中国像美国一样富有，从而像美国一样消耗资源时，地球资源（最重要的是粮食）可能面临的危机；“中国崩溃论”，无非是看到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可能难以承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中国经济掺水论”，也无非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像数据显示的那么快，

但是，即使扣除所谓“水份”，中国的增长仍然首屈一指，何况学术争论的结果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既有夸大的成分，也有低估的成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似乎更倾向于后者；“中国威胁论”，反映的则是各个国家、企业、团体和个人当一个经济的“庞然大物”突然来到自己的身边时心理所感受到的“不安”、“疑虑”和“恐惧”，即使实际上构不成“威胁”，相反，可能还带来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兴趣不在判断“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能和了解“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后果上，他们似乎认定“中国的崛起”是谁也挡不住的趋势，因而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可能出错），热衷于预测中国什么时候赶上日本、什么时候赶上美国。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DP比日本高出35%；1999年，按当年的汇率折算，中国的GDP为9800亿美元，美国为83510亿美元，日本为40790亿美元。乐观的经济学家预测，2010-2015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则要相对保守一点，将这个时间定为2020年-2025年。美国人丹尼尔·伯恩斯坦和阿利·凯撒所著《巨龙——中国的未来：对全球商业、经济和秩序的意义》一书，把预测时间定在了2024年：到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与美国相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产品消费市场；中国成为亚洲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紧追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但已超过伦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中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已成为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内陆城市，如北京、武汉、成都和重庆已成为中国发达经济的重要枢纽；经过30年的资本积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20世纪90年代外资大举投资中国的局面将被颠倒，中国公司将大规模投资亚洲各国和全球……人们为这样的预测而激动不已，因为假如预测能顺利实现的话，那将意味着人类22%的

人口进入发达社会，意味着地球上的发达社会的人口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意味着发达社会的人口接近地球总人口的一半，它所显示的示范效应更是非同小可……

不管怎样，人们在谈论 21 世纪人类的未来时，已经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毋宁说“中国的崛起”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版图”变化的最大、最核心的变量。在很多人的眼里，21 世纪的历史进程将要围绕“中国的崛起”来展开。历史学家似乎已经为未来准备好了命题：如果说 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如果说苏联的建立和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事件，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 21 世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事件。

4 被这个世界边缘化了太久太久的中国和中国人，终于再一次回到世界的“中心”。除了猛然一下被人们关注显得不太自在（不久以前，当外国人评论中国时，语气仍然充满轻视和嘲讽，现在突然如此关注中国，目的何在？有什么阴谋？），因而忍不住要辩驳几句外，毫无疑问，中国人对经济增长的“执着”被这种“关注”加强了，中国人内心的自豪感和勃勃雄心更是受这种“关注”的激发而大幅度“升温”。于是，大楼要建世界最高的，工程要建世界最大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争世界第一。搞企业的纷纷把目标定为“世界五百强”；各省、市、区也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再提前；经济学家们更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再持续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

“现代化”似乎是一枚触手可及、近在咫尺的“桃子”，中国经济增长也似乎可以像现在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保持“高速增长”更是中国政府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因为没有“高速增长”，中国就难以缓解每年新增一千多万劳动力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没有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就无法化解；没有高速增长，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对各项改革的承受力就会大大降低……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决策层的思想中，在发展（在大多数人心里就是“增长”）

中解决一切前进中的问题，已经被当成一条重要经验和行为准则。

不过，只要稍微理性和冷静一点，凭直觉，我们也知道“一直高增长”不可能，看一看西部农村，你怎么也得不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门槛上”的结论。但是，30年前，又有谁会想到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当时人们都为中国经济担心，担心中国经济会成为“下一个”，然而，中国经济不仅安然无恙，似乎比外部世界出现“危机”和“衰退”前增长得更稳更快更好，中国经济能够经受这样的“大风大浪”，说明中国经济具有某种“免疫力”，由过去看未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她的未来充满信心吗？

很多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增长设定了“改革”的条件。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获得成功，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得到协调发展，就业问题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等等。最近一份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就认为，政府职能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国有大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垄断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金融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信用严重缺损、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社会保障制度漏洞较多等，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时报》2003、7、15）。换句话说，只要按照这份“诊断书”开出“药方”，把这些“病”给一一治好了，中国经济未来数十年的持续高增长就不是问题。

也有很多经济专家把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增长的条件锁定在“开放”上。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整个国家而言，1984、1992年是“开放之年”，也是经济高增长之年，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凡是“开放”步伐迈得大而快的时期，经济增长也就快而持久，反之就慢而且间歇。就地区和行业发展而言，东南沿海是开放的前沿，也是增长的“排头兵”；彩电冰箱等行业最开放，竞争最激烈，它们发展得也最好；因此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行业，

发展得就好、就快，反之就差、就慢。2001 年底，中国正式签署文件，加入 WTO，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分步骤地开放农业、电信、金融、贸易和其他服务业市场，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人们期盼着全方位的开放能够激活那些落后的地区、落后的部门和行业，使之得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人们期盼着开放步伐的加快能够“振衰起弊”，使经济生活中多年难以解决的“痼疾”一朝痊愈；人们期盼着全方位的开放能够带来全方位的彻底的改革，首先是政府的改革，政府颁布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必须是中性的，除保证市场契约得到严格执行和具备良好秩序外，不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其次是市场主体的改革，不论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其行为必须合规合法，还要具备与国外“选手”竞争的竞争力……

“人世”第一年，世界给中国打了 90 分。除了促进发展和推进改革外，出口的高增长（在全球经济和贸易衰退的情况下仍增长 30% 以上）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突破 50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两个意外的收获。中国“现代化”似乎正按照预定的“改革”、“开放”的图纸一砖一瓦地建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似乎又获得了新的多重保证。

5 看起来好像是如此：只要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功了，只要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能够更协调地发展，只要就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神话”就会变成现实。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人们发现，改革难度是越来越大，改革动力是越来越弱，改革似乎迷失了方向。原因何在？一些人将之形容为“触及旧体制的核心”、“解决深层次矛盾”；另一些人认为，改革之所以变得困难，是因为它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各群体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有一些人认为，过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到了“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

阶段，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游击战式”的改革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更有甚者，改革不仅没有解决旧的矛盾，反而引发许多新的矛盾；也有人说，改革迷失方向是因为改革失去了利益主体，农村改革的利益主体是农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改革是因为要吃饭，而现在的一些改革则没有这种利益主体，更没有这样的利益冲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改革效益出现加速递减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改革那种几乎是瞬间的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不见了；一些领域的改革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最后还是推倒重来；有些领域的改革似乎是一个长得看不到头的连续不断的“试错”过程；还有些领域的改革过程伴随着不公平、腐败和人们的不满……

在一片迷茫之中，人们转过身来，重新把眼光转到“开放”上，希望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我们作出了很多承诺，我们必须兑现，而这些承诺的兑现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在开放时间表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改革，以便能够“与狼共舞”，而不至于被狼吃掉。不过，这只是部分地解决了改革的动力（压力）问题。在开放过程中，人们反复谈论着“与国际接轨”，似乎这就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实践证明，很多“洋玩意儿”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看起来，“以开放促改革”像改革本身一样也遇到了很多难题。

因为改革的滞后，我们的增长正在变得不那么“合意”，甚至在走向我们愿望的反面。

首先，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经济增长无论快慢，都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快速积累。经济增长慢的时候，企业（国有企业）效益差，债务积累上升，对贷款的依赖增强和还款能力下降，势必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国有银行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和“硬的预算约束”，没有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意愿，势必无节制地放贷，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国有银行占有 80% 的总信贷资金，吸收 75% 的居民储蓄，

却创造不足 30% 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国有企业“输血”，受其拖累，银行系统进退维谷。另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权割裂，国有股一股独大，肆意侵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股市投机之风盛行，筹资功能近于枯竭，而股市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错失了一个又一个彻底解决的良机；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我们的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券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都是清一色的“国”字号，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积累着金融风险。

其次，经济增长对“社会下层”（即所谓的“弱势群体”）的“滴入”效应正在降低甚至趋于消失。这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据调查，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中，收入最高的 10% 家庭的购买力是收入最低的家庭的 10 倍以上；就全国而言，收入最高的 5% - 10% 的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5% - 10% 家庭的 50 - 100 倍。（据《经济观察报》2003、9、8）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好处正越来越集中地流向极少数人的腰包，而绝大多数人则很少受益甚至受损。经济增长的收益向少数人倾斜，同样表现在东西和城乡差距扩大上。从 1978 年到 1995 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从 45.9% 迅速增加到 56.5%。2002 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 3.3:1，实际差距比这个要大得多，可能是 5:1，甚至是 6:1。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人均收入和西部贫困的省份相比，大约也是 4:1。很多城市和农村人口脱贫之后又立刻返贫。经济增长的收益向少数人倾斜，还表现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联效应”正在大幅度下降上。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 240 万个就业岗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只能增加 70 万个岗位。2003 年，300 万大学生中约有 50 万找不到工作，说明失业开始向知识群体蔓延。总之，“增长”，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魅力四射”的词了，它带给更多人的是“挫折”、“贫穷”、“失落”和“失望”。

再次，与上面一点相关联，我们增长的内生动力似乎存在减退的趋势。从 1998 年开始，我们经历了长达五年的通货紧缩，至今挥之不去。我们劳动力充沛，资金充沛，各种生产要素都不缺，但是经济增长就是不断下滑，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为什么？除了经济周期方面的原因外，与我国经济存在很多非市场化的垄断领域有关。民间投资仍然存在很多禁区。民间投资超过 50% 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和房地产业等；比重低于 20% 的有采掘业、电力、煤气、水、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交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影视文化等，这些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占 80% 以上，大量的资本被阻挡在这些领域之外，阻碍了这些领域的发展，也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第二个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最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增长带来的好处，有钱的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没有钱，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价格就下跌，增长就受阻。第三个原因是最长远的制约：我们科技创造力（包括科技成果市场化能力）严重欠缺，市场能提供的项目都是“大路货”，这些项目没有市场，没有利润空间，也就没有投资价值；科技能力的欠缺归根结底是因为科研的非市场化，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绝对不能熄火，怎么办？政府通过发债券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 年 8000 亿，以弥补市场投资和消费“放慢”带来的“缺口”，维持“七上八下”的增长。应该说，由于多年来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和政府背负着大量本不属于政府承担的职责，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很多“欠账”，这次大规模的集中投资有利于“还欠”，从而解决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投资属于“超前投资”，如大山沟里修那么多高速公路，没有几辆车跑，纯粹是一种浪费。而且，国有投资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又大幅上升，在资金和市场两方面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压之势，使民间投资更加低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计划经济的回归。

6 我们的改革是不是太执着于某些东西，以至于一叶障

不见泰山？我们如果抛开“一城一地的得失”，换一种思维，是不是就豁然开朗呢？比如，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改革，过分地执着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而不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这项改革，及时调整改革的方向和方式，我们是不是在追求一种改革的“乌托邦”？或者是钻改革的“牛角尖”？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已经付出的和未来将要付出的），把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得像私营资本一样具有硬约束、高效率，先不说有无可能，即使做到了，试问：值吗？更何况 20 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不可能把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得像私营资本一样具有硬约束、高效率。现在，在改革的“柜台”上标出了三种产品：一种质次价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未成功），一种质优价廉（私营经济），一种质优价高（付出很高代价取得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我们该买什么样的产品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再比如，东西、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不能单从财政层面上来考虑，也不能单从政府开发政策层面上来寻求答案，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能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吗？力度太小不管用，太大了就会伤及东部，回到“穷平等”的老路上去。加大对“三农”政策扶持的力度，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吗？农村的“地利”就那么大，农产品的比较价值就是那么低，这是自然和市场的规律，政府有这个能力改变吗……

7、2003 年的春夏之交发生的三件事，显示出某些征兆，发人深思，让人对物质至上的发展观和继“摸着石头过河”之后“以开放促改革”的现代化“路径”产生几分疑虑。

第一件事是学名 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在这个春天的爆发。因为 Sars，中国 GDP 损失了多少个百分点，它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别是什么，众多专家已作了连篇累牍的分析，这里不想赘述。这里要说的是，Sars 是对中国一段时间以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当头棒喝，它告诉我们：没有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单纯追求物质增长是危险的、行不通的。可以想

见，如果仍然是单纯追求物质增长，那么，传染疾病、糟糕的天气、各种自然灾害等等，在明年、后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不速之客”。

第二件事是孙志刚被害事件。一个外地有大学文凭的打工仔被迫害致死，而且是在号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省会——广州市，在青天白日之下，在政府机构——难民收容所。一个大学文凭的打工仔尚且如此，你能想像出那些绝大部分没有文化的农村打工仔所遭受的待遇会是怎样的恶劣吗？它反映出的难道仅仅是执法人员粗暴执法或者一两个法规的不合理的问题吗？不，它反映出的是整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既是社会的、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同样可以断定，如果城乡二元体制不改变，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孙志刚事件”出现，久而久之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严重分裂，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遭到破坏，而且，城乡二元体制不改变，“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9亿农民富不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件事是“上海首富”周正毅违法事件。一个私营企业主，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舞台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制度不健全会造就一个“恶的”、“不公正的”市场经济，人们有理由担心，制度不健全条件下的扩大开放，除了促进改革以外，是否会为腐败和犯罪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只要经济活动中仍然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政治权力“租金”，不管这种“租金”是来自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都会产生权钱交易，伴随“寻租”而来的腐败不会因为开放而自动消失甚至有所收敛，相反，会更加猖獗。

显而易见，这三个事件中暴露出的体制的、观念的、社会的、经济的复杂问题，决不是单靠“高增长”就能解决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恰恰是高增长带来的问题，越是“高增长”，这些问题就会积累得越多、越深；这些问题也不是目前这个“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层面和改革方式所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循着“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径”所能解决的。

8、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像欧、美、日那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像印度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制造”的汹涌而入产生了某种警觉。2002年，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居世界之首，占整个调查数的27%左右，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到5%，其它针对中国的非关税壁垒也日益增多；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高，最先是日本，然后是美国、欧盟和韩国，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外资和外贸赢余的快速增长开始影响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导致中国货币发行过多，要防止经济过热，势必要紧缩银根，从而对国内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也就是压缩国内投资、为外资腾出空间……这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一贯行之有效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和阻力，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种发展战略作出某种调整。

9、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25年中，虽然有过曲折和困难，但是，我们实现了在1/4世纪里人均收入“翻两番”的阶段性目标，我们向着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不过，看起来，“现代化”仍然不是“即将到手的桃子”，我们仍然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我们目前似乎面临着“改革困难”、“开放压力”、“体制痼疾”、“发展不平衡”和“战略调整”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今后的路走得如何，取决于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以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事业，仍然是前无古人的。正如建一幢大厦，前25年是筚路蓝缕，完成的是平整地基和筑基的工作，至于怎么建大厦、大厦的大小和内装修如何、大厦周围的院落怎么布置、大厦的风格如何等等，都将是今后的任务。因此，光有“萧规曹随”是不行的；但是，创新又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人们常说，制度即文化，而文化即传统；

又说，一个国家发展得如何，不取决于她对传统的东西抛弃多少，而取决于她能不能发现和发掘传统中适应现代需要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因此，如果不能认真地汲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总结 1840 年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路的得失利弊，不研究中国古代兴盛和衰落之由，不深入地考察中西文化历史的差异，没有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经济的全方位视角，我们现代化的“大厦”即使建成了，也不可能是“美仑美奂”的、有特色的建筑。

本书尝试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西方对比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众所周知，至少在漫长的 15 个世纪当中，古代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人类文明的前列，为什么在古代中华文明的“胚胎”中没有孕育出现代文明？为什么发展相对落后和条件相对恶劣的西欧却后来居上，实现了文明的跃进？为什么同样是面临西方的挑战，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日本却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什么 1949 年后我们没能立即走上现代化之路而被亚洲四小龙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978 年后我们改变了什么以至于创造了“中国奇迹”？什么原因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着“多增长而少发展”或“多经济发展而少社会发展”等种种不足？我们在未来现代化征程中可以从中西方历史中汲取点什么……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丛林”中的某些“陈迹”，也许正是“医治”现实之病的“良方”，更何况我们要建的“大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她的根基必须深深地“扎”在历史的土壤中。

诚然，我们比我们的前人（不仅比汉、唐、宋时的人，也比 1840 年以后的人）更加了解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知道市场化、开放、竞争、效率、公正公平的法律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也知道计划经济、封闭、垄断、不公平、寻租等腐败行为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有一些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事情可能是一知半解。我们不了解文化

习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不了解无形的东西对竞争力的作用，我们不了解文化和思想的“生产”规律，我们不了解科技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我们一直以为只有稳定才有发展，但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稳定没有导致发展而西方不稳定却跑得飞快？我们一直以为“开放”是经济的“发动机”，但是，为什么一些很开放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却饱受危机之苦……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说：“过去之井深又深”，“我们是否可称之为无底洞呢？我们愈是深入探索就愈会发现人以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最根本的基础是深不可测的……不可探索的事物与我们的探索热情玩游戏；它向我们展示可见的目标，然而，当我们到达目标时，后面还有过去在延续”。（转引自《现代资本主义》）本书绝没有奢望去解开所有的“不了解”之谜，只是想在“历史之井”中为后人的发现做一些铺垫。本书非史非论，亦史亦论。亦史亦论，故而于“史”可以任意剪裁，于“论”则可以信马由缰；非史非论，故而于“史”不免粗疏，于“论”则不免乖谬。抛砖引玉而已！

第一章

现代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

——以中国为参照系看西欧

